

前 言

当我们打开闭锁的国门时，惊异地发现，原先在总体上并不比我们强的日本竟已实现了超英赶美的目标。在赶超发达国家的道路上，日本有它的成功与失败、经验与教训，可为后来者提供许多值得思考的材料。

日本 1868 年明治维新后确定的国家战略目标是赶超欧美工业发达国家 跻身世界列强之林。当时 它采取穷兵黩武政策 沿着“强兵—侵略—富国”的路线，同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国家争夺亚太地区的殖民地，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这同时也是一条与亚洲人民为敌的道路，终于在亚洲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打击下，彻底失败。战后日本在战争的废墟上重建家园，它仍以赶超欧美工业发达国家为目标 但是采取的是“贸易立国”方针 在所谓“美国主导国际秩序”的条件下 顺利执行“经济优先”的发展战略 实现了战前用军事手段未能达到的目标。到 60 年代末，日本的经济规模已跃居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位。当时的首相佐藤荣作曾踌躇满志地宣布：日本不仅要作经济大国，也要作政治大国。但是在美苏尖锐对抗的国际格局中 日本无论在经济方面 还是在外交、安全 甚至在内政方面，可以选择的余地是很小的。它不能不依然遵循占领期结束时所确定的外交路线和政策，作为西方盟国的一员，追随美国的敌视社会主义国家、反对民族独立解放运动路线，并以日美联盟为基轴，在美国全球战略的框架中，谋求扩展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的空

间。

1971年的“尼克松冲击”和1973年的“石油危机”给陶醉于“经济奇迹”的日本当头一棒。日本开始意识到完全依靠美国维护安全与繁荣的时代即将结束，日本必须尽快改变事事追随美国的“政治小国”地位，而要“适应形势，增大在国际上的政治作用”，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日本向何处去”这个问题就尖锐地摆在了日本的面前。日本能否继续沿着战后几十年形成的道路走下去，抑或改弦易辙回到战前那条“强兵—侵略—富国”老路上去？战后国际关系史表明，后一条路已经行不通了，日本只有维持一个“没有战争威胁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社会”，才能保障其国家生存、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从这个时期起，日本就开始其战略转折的进程。

进入80年代，美国主导国际秩序的体制发生动摇，日本逐渐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和“资本输出大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开始超过美国，其海外资产迅速膨胀，经济触角遍及世界各地。中曾根首相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的纲领，一再强调“应发挥与经济大国相适应的国际作用”，对内政、外交以及防务政策进行了明显的调整，加快向政治大国目标前进的步伐。

进入90年代，随着东欧变色、苏联解体，世界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来由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立而形成的世界战略结构瓦解了，冷战时代也宣告结束，世界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日本认为，冷战格局所具有的冲突控制机能已消失，世界进入一个多极化的时代，意识形态和军事对立正转变为围绕争夺经济霸权的竞争，美欧日的经济规模占世界的2/3，美欧日协调体制是掌握今后世界和平与繁荣的关键。已成为发达国家主要成员的日本，不能再执行以往那种被动接受国际秩序的外交了，而必须尽早从“中小国外交”转化为“大国外交”，通过积极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努力来确保本国的安全与繁荣。

日本在经济、技术方面的迅猛发展为其成为政治大国做了“物质准备”在社会思潮方面的转变则做了“思想准备”政治体制的改革及政治势力的改组又为之做了“组织准备”。与此同时在外交方面也适时地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力图增大其在世界事务中的发言权，与其他政治大国平起平坐。本书将探讨战后日本如何从战败国成长为经济大国，又将如何在经济大国的基础上，向政治大国迈进。从战后日本发展的轨迹中，不仅要了解日本采取过什么有效的政策，正在执行什么政策，更要了解日本的成长过程对我们有哪些有益的启迪。此外，日本在达到经济大国和政治大国的目标之后是否会成为军事大国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对此本书也将进行讨论。

在探讨本书主题之前，首先需要讨论一个概念上的问题，即什么是“政治大国”？其标准是什么？如何界定其内涵和外延？我们认为所谓“政治大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同的时期和空间由于参照系的变化，可能提出不同的衡量标准。“政治”不同于“人口”、“资源”、“经济”可以按照可比的数量或质量来排定大小强弱。比如根据资源拥有量可以确定某国为“资源大国”或“资源小国”根据经济实力的大小可以确定某国为“经济大国”或“经济小国”。而政治范畴中参照系的内涵则不同于其他范畴，几乎没有可以具体量化的内容，往往根据政治地位（资格）的升降或采用得票率多寡这些间接方式，作为判断大小强弱名次的参考。首先，要看它对国际事务参与能力或说发言权的大小。一般而言，参与能力大小在不同时期依据不同的实力：战时或冷战时期，主要依据军事实力，冷战后则主要依据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其次，要看它在世界上影响力的大小。这种影响力主要看它的对外政策能代表多少国家的利益，还要看它的国际形象及与各国的关系好坏。在强权政治时代，大国对其他国家的控制或庇护也会转化为影响力。如果上

述论点能够成立，那么日本将会成为什么样的政治大国，以及将通过什么途径达到其目标？这也是本书试图回答的一个问题。

本书共分 6 章，第一章主要探讨战后日本如何在战争的废墟上重新站立起来，并发展成为世界第一流的经济大国（由张舒英副研究员执笔）；第二章主要通过日本的对外经济战略来探讨日本如何依靠其经济实力向政治大国的目标前进（由韩镇涉研究员执笔）；第三章探讨日本如何成长为技术大国，又如何利用其技术实力为实现政治大国的目标服务（由冯昭奎研究员执笔）；第四章探讨实现政治大国目标的社会思想基础及政治体制的调整（由王金生副研究员执笔）；第五章探讨日本为实现政治大国的目标而进行的外交努力（由周季华研究员执笔）；第六章探讨日本的军事实力将在其实现政治大国目标中起何作用（由赵阶琦研究员执笔）。此外，为了帮助读者了解某些事件的背景，书末还附上 3 篇附录。

目前国内外探讨日本走向政治大国的论著已经发表了一些，我们想通过系统的回顾与分析来参加这场讨论。由于水平和资料有限，一些论点可能不够成熟，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第一章 走上经济大国之路

一个国家在世界上所处的地位及其所具有的影响力，归根结底取决于它所拥有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日本向政治大国迈进是以其经济技术实力为基础的。本章主要阐述日本如何从战争的废墟上成长为经济强国，有过什么经验教训，当前具有什么经济实力和潜力，在世界中所处的地位，以及它所面临的课题和今后的发展前景。

第一节 从废墟上崛起

日本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了两份回报。一份是负的，以物质形态留在日本列岛上；一份是正的，以文字形态写在日本的宪法上。

30年代以来，日本发动“大东亚战争—太平洋战争”不仅给亚洲许多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给日本人民留下了严重的战争创伤和精神创伤。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时，42%的国民财富毁于战火；19座城市遭到程度不同的破坏，200万户住宅夷为平地；工业部门的生产装备或因超负荷运转，或因未及时维修、更新，严重老化，几乎成为废铁。道路、桥梁、港口等社会基础设施陷于瘫痪。

或半瘫痪状态。

另一方面，饱尝战祸之苦的日本人民，在战后得到了一部“放弃战争”的和平宪法，得以休养生息，重建家园。战后，日本原来生产军需物资的企业纷纷转产民需用品。当美国忙于开发高新技术，将其用于装备新式武器时，日本则利用这些技术改造生产设备和工艺，生产出了可以进入寻常百姓家的照相机、电话机和各种家用电器。进而用这些商品在国际市场上换取它所需要的一切，从能源、原材料到世界各地的土特产，维持其国内市场的繁荣。战前，日本依靠军事力量未能实现的目标，现在却通过和平的手段得到了。历史证明，这部宪法使日本受益非浅。

战后初期，围绕发展方向与发展道路问题，在日本曾有过不同的主张，并展开过激烈的争论。但是，无论是哪种主张，都认为经济是国家生存之本，国家的国际地位及实力，最终取决于经济。日本政府广泛听取各方意见，根据日本国情，制定了一系列有效的政策，很快地恢复到战前的经济水平。

一、调整经济体制

战后日本的经济的发展，首先面临着双重转轨课题：一重是在生产的物质内容方面由军事经济转向和平经济；另一重是在经济体制上由统制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后一重转换显然比前者的难度更大，它涉及政治、经济、社会乃至价值观念等各个方面。但是，日本转换经济体制的难度又因如下两方面的因素而相对减轻：（1）美国对日实行全面占领，并迫使日本朝市场经济方向进行改革。（2）在被置于死地的境况下，日本所追求的目标十分明确乃至单纯，即谋求经济上的自立与重新崛起。因此，怎么有利于经济发展就怎么干。在这种背景下实现的经济体制转变，确立了如下的基本框架：

1. 在农业方面确立起了自耕农制。经过战后的农地改革，基本上摧毁了寄生地主制，使土地为耕种者所有，大大解放了农业生

产力。

2. 重新确立起企业的主体地位。随着统制经济的瓦解，政府的经济职能逐步转向弥补形形色色的市场缺陷，如制定总体规划、计划和各种经济政策，收集、整理和发布各种基础信息，运用财政金融等手段对经济进行诱导等。与此同时，企业，特别是民间企业在经济中的主体地位被重新确立起来。企业开始按照自己的意志从事生产和经营活动。

3. 形成了小财政、大金融的资金分配体制。财政和金融是分配社会资金的两条渠道。战后，日本的财政规模一直很小，财政支出（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合计）占国民总支出的比重最高时不过30%。在社会资金分配中起主体作用的是金融。日本的金融体系非常发达，金融网点密布全国各地。庞大的金融体系不仅有助于形成强健的筹资机能，而且有助于形成高效益的经济运行机制。

4. 确立了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实行经济民主化和解散旧财阀，一方面打破了家族式的垄断体制，给企业和经济带来了竞争的气氛，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开始运行起来；另一方面，股权的分散化加快了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分离，使经营者阶层很快成长起来，以扩大事业为志向的经营思想也逐渐成为企业经营的主流。

5. 形成了受法律约束的小政府。战后日本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改组服务于战争的国家机器。到1952年政府机构的改组基本告一段落。改组后的政府机构由1府（即总理府）、12个省（通商产业省、大藏省等）构成日本的1府12个省相当于我国的部级行政机构。日本政府机构的建立及其活动，实行法定主义原则。所谓法定主义原则，即任何一个政府机构的存在及其活动，都有相应的法律依据，没有法律依据的机构便是非法机构，没有法律依据的政府活动便是非法活动。政府机构实行法定主义原则的意义突出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约束政府的行为，防止其滥用职

权；二是抑制政府行政机构的膨胀。从 1952 年到现在的 40 多年时间里，日本内阁 1 府 12 个省的建制一直没有变。显然，小政府可以减少行政消费，从而有利于减轻国民经济的负担。

战后的体制改革为日本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并不等于解决了日本加快赶超所面临的全部矛盾与问题，如恢复和发展经济与资金严重不足的矛盾，技术和经营管理水平落后，企业中的劳资纠纷，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工业布局不合理，城市盲目发展，生产力布局不平衡等等。日本在处理各种社会经济问题上，表现出了与其所追求的目标——经济自立与重新崛起的一致性。这突出表现在：

1. 追求经济合理性，不以主义论取舍。日本在这方面的事例很多，这里仅举其一。战后初期，日本经济面临的一个深刻矛盾是：百废待兴，而财力、物力极为有限。为使有限的资金和物资发挥最大的效益，1946 年，东京大学的有泽广巳教授提出了“倾斜生产方式”的设想。该设想主张把经济恢复的重点首先放在煤炭、钢铁等基于产业上，以此带动整个经济的恢复。有泽广巳本人是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经济学家，他所提出的“倾斜生产方式”实质上是对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的运用。但是，日本政府并未因其人、其建议的主义色彩而拒绝采纳。吉田茂任首相时，还曾动员有泽教授出山，作政府的经济要员。尽管有泽教授没接受，但遇有经济难题，吉田茂仍经常向有泽教授请教。

2. 学美国，也学苏联和中国。由于美国的强大以及战后日美之间的特殊关系，日本从美国那里学了很多东西，诸如西方经济思想、市场经济原理、现代化管理、科学技术等等。另一方面，对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在全新的发展模式下所取得的经济成就，日本不仅注意到了，而且也在研究和学习。在两大阵营剑拔弩张、冷战气氛笼罩全球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却于 1961 年 8 月 15 日在东京举

办了苏联样板城市展示会。中国的“两参一改三结合”也被移植到了日本的企业管理中。

3. 搞市场，也搞计划。经过战后初期的改革，日本由统制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然而，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一方面，日本放弃了经济统制；另一方面，经济计划却以多样化的形式，在各个层次上表现出来。迄今，日本历届内阁已经发布 12 个综合性中长期计划、4 个国土综合开发长期计划、10 个道路建设五年计划、10 个住宅建设计划、100 多项与产业有关的计划以及各种地理上相互交织的区域开发计划。日本并没有因计划挂着社会主义的标签而将它拒之门外。

日本在发展经济上较少受意识形态的束缚，不以政治信条强制经济，不按意识形态去搞经济。凡是有利于把经济搞上去的方式和做法，它都吸收。日本以其实践表明：经济活动往往比政治生活更超脱、更多彩，经济活动本身往往不问主义。

二、为经济大厦奠基

若把发展经济喻为建设大厦，那么，要想使大厦建得又高又稳固，首先需要打好基础，筑好框架。战后，日本经济这座大厦是建立在自然资源贫瘠的岛屿上的。然而，在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石油危机中，日本经济这座大厦不仅没有坍塌，而且又增高了一截。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日本不断巩固其经济大厦的基础结构。

（一）注意改善经济素质

就自然禀赋而言，日本并无优势，其所需要的绝大部分能源和工业原材料依赖进口。日本的经济规模能否扩大，能否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能否卖出更多的产品和换回更多的原材料，或者说取决于其产品的竞争能力。然而，当日本失去海外的殖民地，要靠自身的能力从国际市场上换取原材料、完成再生产的循环时，问题便明确无误地暴露出来：产品成本高、质量差，难以赢得

市场。对于加工贸易型的日本经济来说，失去市场就意味着失去立国之本。要提高日本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必须首先提高自身的经济素质。

1949年9月，日本政府决定进行“产业合理化”，并先后建立了产业合理化审议会（1949年12月）和产业技术审议会（1950年12月）从钢铁、煤炭等基础产业开始，逐个研究各个行业存在的问题，制定实行合理化的规划与办法，先后发布了《钢铁业合理化方案》（1950年6月22日）、《钢铁及煤炭合理化要纲》（1950年8月18日）、《企业合理化促进法》（1952年3月1日）、《硫安企业现代化三年计划》（1953年2月7日）、《制铜业合理化三年计划》（1954年10月19日）、《煤炭氮肥业合理化三年计划》（1955年2月21日）、《对机床等15个行业实行合理化的计划》（1956年12月11日）并同意某些行业或企业建立合理化卡特尔。

通过实行产业合理化，促进产业淘汰老旧设备，引进先进技术，使产业活动建立在现代化的技术装备水平之上。由此而形成的工艺流程的改善，带动了企业产品质量、劳动效率以及管理水平的提高，从而大大改善了日本经济的基础素质，为日本经济这座大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大力发展能源和电力工业

作为能源资源贫乏的日本，确保能源的稳定来源与供给，一直是一个重要的政策课题。战后初期，日本优先恢复的重点生产部门之一便是煤炭和电力。电力工业最先超过战前生产水平，1946年的发电量为战前（1936年）的111.6%，为整个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提供了条件。

1949年，美国占领军当局批准日本建设33个水力发电站，1950年以后，日本开始大规模进行水电站的建设。1951—1955年，日本开发银行将资金的50%左右投入电力工业。这为此后重化工

业的大发展提供了先行条件。

1955年以后,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对电力等能源需要的增加,日本先后建起了大规模火力发电站、原子能电站,并利用天然气和高炉煤气发电。

石油危机以后,日本一方面开发和推广节能技术,建立能源储备设施,另一方面开发和利用太阳能、风能、原子能等多种能源。从1945年到1985年,日本的发电能力增长了16.3倍,发电量增长了30.7倍,^①大体上保证了使电力等能源先行一步。5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经济的发展,基本上没有因为电力等能源不足而受到制约。

(三) 促进运输业的发展

在运输业方面,日本最初的发展重点是船舶和海运。日本政府以“计划造船”的方式扶植造船业的发展。早在1954年,日本的造船量就达到了世界第一位。这与日本社会再生产的特点不无关系。对于加工贸易型的日本经济来说,海运是社会再生产中的“咽喉”,工业原材料的运进和各种产品的输出都要靠海运。

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扩大对内陆运输的需求迅速增长,作为内陆运输重要手段的铁路运输和汽车运输业迅速发展起来。在铁路运输方面形成了国营、公营、团营、私营铁路激烈竞争的局面,竞争促进了铁路交通网的建立与健全。公路运输业基本上是以民间为主体。与此同时,汽车工业逐步发展成为日本的一大支柱产业和拳头出口产业。航空运输业也在迅速发展。

(四) 加强社会基础设施建设

战后初期,日本重点抓的是物质生产部门的恢复与发展,忽略

^① (日) 夙野恒太纪念会编:《日本国势图绘》国势社1988年6月1日发行版附录1-A。

了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然而，当民间投资趋于活跃、经济进入起飞阶段时，铁路、公路、港口、工业用水等社会基础设施不足的问题便突出起来，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因此，从 1957 年开始，日本政府才真正着手进行这方面的建设。政府资金的运用重点开始由产业转向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投资在 GNP 中的比重由 1956 年的 1% 迅速上升到 3.5% 以上。日本政府还将加快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列入《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4 年度，公路建设费高达 5803 亿日元。在 1965 年以后的 10 年里，公路投资几乎与 GNP 同步增长，并一直维持在占 GNP 2.5% 的水平。铁路、港口、工业用水、通讯设施建设等的投资也迅速增加。为加强这方面的建设，日本还成立了相应的机构，如日本道路公团、日本铁路建设公团、水资源开发公团、新东京国际空港公团等。日本先后制定了 10 个《道路建设五年计划》、7 个《整建下水道五年计划》、7 个《治水事业五年计划》、5 个《整建特定交通安全设施等五年计划》、5 个《海岸事业五年计划》。^① 自 1960 年以后，加强社会基础设施建设问题，无例外地被历届内阁纳入中长期经济计划之中。

通观战后日本的经济的发展，社会基础设施方面的建设，总是处在滞后和紧追紧赶的状态。尽管如此，这方面的“瓶颈”毕竟在迅速拓宽，从而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条件。

（五）大力发展基础材料工业

基础材料工业的质量和成本，影响着所有下游产品的质量和成本，关系着这些产品能否赢得市场、有无竞争力。因此，基础材料工业的状况，决定着整个工业乃至国民经济基础的虚实，这个基础打好了，整个工业乃至国民经济的发展才有后劲。

^①（日）建设省编：《建设白皮书》，大藏省印刷局，1991 年 7 月 25 日发行，资料篇第 32—33 页。

从某种意义上说，战后日本工业和经济的现代化，就是从改善基础材料工业的素质开始的。战争结束后不久的 1951 年，日本就连续以《钢铁工业合理化计划》的形式改造和强化钢铁工业，引进先进设备和生产工艺。到 1964 年，日本的钢铁产量已超过原西德，成为仅次于美国和苏联的第三大钢铁生产国。到 70 年代初，日本成为世界上钢铁设备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大大提高了钢铁的质量和产量。1973 年，日本的钢产量达 1.19 亿吨。

除了钢铁以外，日本其他材料工业的发展也都非常迅速。1970 年，电解铜的产量分别是 1960 年和 1950 年的 2.8 倍和 8.3 倍；铝的产量分别是 1960 年和 1950 年的 5.6 倍和 29.1 倍；铅的生产量分别是 1960 年和 1950 年的 2.8 倍和 12.3 倍；锌的产量分别是 1960 年和 1950 年的 3.7 倍和 13.8 倍。（参见表 1—1）

表 1—1 日本主要基础材料工业发展状况

（单位：万吨）

产 品 \ 年 度	1950	1960	1970	1980	1990
电解铜	8.5	24.8	70.5	101.4	100.8
铝	2.5	13.1	72.8	109.2	225.7
铅	1.7	7.4	20.9	22.1	26.1
锌	4.9	18.1	67.6	73.5	68.7
生铁	223	1189	6805	8704	8023
粗铜	484	2214	9332	11139	11034
塑料	…	55.4	512.8	751.8	…
纸浆	74.9	353.2	880.1	978.8	1132.8

资料来源：〔日〕矢野恒太纪念会编：《日本国势图绘》，国势社 1988 年版，附录 1—B；东洋经济周刊编发：《经济统计年鉴》1992 年版，第 179—182 页。

〔日〕矢野恒太纪念会编：《日本国势图绘》，国势社 1988 年 6 月版，附录 1—B。

从技术水平上看，日本基础材料工业的技术起点均比较高，基本上都是用战后最新技术装备起来的。坚实的基础材料工业，为加工工业提供了质优、量足、品种齐全的原材料，为整个经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创造发展条件

任何事情的成功，都离不开一定的条件，发展经济也是如此。要加速发展，实现经济赶超，同样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

需要指出的是，促成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发展的原因和条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古代日本固有的。那些在当时或在今天看来是既定原因和条件的东西，无非是以前的历史产物，而历史产物又是有意识、有目的活动的人创造的。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发展的条件，有许多是日本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创造的。

（一）健全法制和经济秩序

无论对于个人、公司，还是对于政府来说，以自由竞争为原则的市场经济，并不意味着可以不受限制、不要管理，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相反，自由竞争需要在严格的竞争规则下进行。广义“竞争规则”的表现形式便是法律。战后初期，日本在由统制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法律建设步伐也明显加快。一方面，对《日本银行法》、《商法》、《保险业法》等原有法律作了重大修改；另一方面，制定和公布了许多新的法律，如规定国会行为的《国会法》（1947年）规定政府行为的《内阁法》（1947年）《财政法》（1947年）《地方财政法》（1948年），为保护自由竞争和公正交易的《关于禁止私人垄断和确保公正交易的法律》（1947年），有关金融方面的《临时利率调整法》（1947年）《证券交易法》（1948年），有关国土利用问题的《国土综合开发法》（1950年）等许多重要法规，都是在日本由统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时期出台的。

所谓健全法制，并不单单是制定法律条文的问题。如果执法体系的建设跟不上，就不能维护法律的尊严。如果国民没有法制观念，就不能保证市场经济有序地运行，从而也就难有经济的顺利发展。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包括政府在内的社会每一个组成部分和每一个成员都具有高度的法制观念。对于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来说，法制观念不是天生就有的，也不是呼之即来的。法制观念需要长期培养。如果说较强的法制观念是战后日本经济得以顺利发展的有利条件，这方面的条件同样需要去创造。

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战后日本在增强法制观念、健全法制方面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战后初期，东京地方法院的推事山口良忠发誓宁愿饿死也不买黑市大米，最终因缺乏营养而死去。在他死前的日记上写着：“《粮食统制法》虽然是一部坏法律，但既是法律就必须服从。不管生活多么困苦，我绝不买黑市的东西。宁愿饿死，也要为坚决维护《粮食统制法》而与黑市作斗争。”山口良忠之死，曾轰动一时。这一方面表明他的精神对当时的社会影响之广泛，另一方面也说明日本在以此宣扬法制观念。

虽然日本经济中也存在这样和那样的问题，但总的看，日本经济的运行比较有秩序。这是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发展的基础条件之一。

（二）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养

劳动力是生产力诸要素中最重要的一项。然而，劳动力的素质不同，对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大不一样。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劳动力素质愈优良，科学技术成果愈能在生产上得到广泛而有效的运用，劳动生产率愈能迅速提高，经济愈能迅速发展。

必须指出，劳动力的素质优劣，主要不取决于科技方面“尖子人物”的多寡，而是取决于全民族文化素养的高低。日本获得诺贝尔奖的“尖子人物”虽不多，但其全民族的文化素养不逊于

任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养，绝非一朝一夕、一招一式所能奏效。日本在提高全民族文化素养方面，做到了长期坚持不懈。早在明治初期，日本就开始强制实行小学义务教育。战后初期颁布的教育法又将义务教育年限延长为 9 年（即至初中），日本的义务教育并非完全是不花钱免费上学之意，而是说，送学龄子女入学是父母应尽之义务，不尽义务者要受惩罚。在日本，教育受到方方面面的重视。

一是政府重视。日本政府把教育列为 A 级（头等重要之意）社会投资，历届内阁都把学校教育当作长期经济政策的一环加以考虑，教育经费在总行政经费中所占比重一般在 1/5 左右。

二是民间重视。在日本，重视教育已成为一种社会风尚，而不是等经济发展起来，有了余钱才拿去办教育。战后初期，日本经济虽陷于瘫痪，但是教育没有停顿。在瓦砾场上、露天地里，老师在讲课，学生在学习。现在，日本各类高中的 25%、大专院校的 78% 是民间举办的。大学教育已进入“大众化阶段”。此外，社会上还有各种讲座、教室，企业则根据各自的需要开展职业培训、技术教育等。

三是个人重视。有人称日本是“学历社会”，不光政府机关，就连民间企业、社会团体也都普遍奉行“任人唯学历”的原则。不要说出人头地“成龙”，就是为保住饭碗，除按部就班地经过正规学校、取得“科班”出身的学历外，一般别无捷径可循。一个人要在“学历社会”中生存下去，站住脚，就不能不重视学历和教育。

较高的劳动力素质和全民族的文化素养，是日本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和实现赶超的重要条件。这个条件同样是在创造中得到的。

（三）增加储蓄，积累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

任何一个后进国家要赶超发达国家，都需要进行大量的经济建设投资，因而都会遇到资金不足的问题，日本也不例外。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 70 年代初的约 30 年时间里，日本一直存在着资金不足的问题。然而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日本经济取得了迅速的恢复与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经济的迅速恢复与发展，基本上是靠本国财力实现的。统计资料表明，1961—1965 年是日本利用国外资本较多的时期，即使在这个时期，外国资本在企业筹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也只有 5.7%。发展经济所需要的庞大资金基本靠国内筹措，国内资金则主要来源于储蓄。

战后初期，为筹措恢复经济所必需的资金，日本在全体国民中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救国储蓄运动”。在日本经济濒临崩溃的时候，日本把参加储蓄提到了救国的高度。

为增加储蓄，根本不办理个人和企业存贷款业务的中央银行也上下齐动员，利用各种机会奔走、演讲，积极从事储蓄宣传活动。为增加储蓄，大藏省银行局亲自出面同掌管物资的商工省交涉，提请配给胶鞋、旱伞、自行车等物资，用以鼓励储蓄。为增加储蓄，孩子们“过家家”玩的游戏竟引来了“儿童银行”的建立和普及，星星点点的零花钱被聚集起来，变为资金。为鼓励储蓄，日本政府把天皇搬出来接见“储蓄运动”的功臣们。为抑制提储风潮，日本政府采取过冻结存款、旧币换新币的强制储蓄措施。

为宣传和鼓励储蓄，日本在中央一级设有“增强储蓄中央委员会”，都道府县（相当于中国的省级政府）一级设有“推进储蓄中央委员会”，一些市町村还建立了“储蓄实践区”；大藏省银行局内设有储蓄奖励官，研究和制定增加储蓄的方针政策，对促进储蓄事业发展的各种民间组织进行指导，给予扶植和奖励。